

# 古巴导弹危机决策分析

桂立

促使苏联把导弹运进古巴的决策因素是：为了保卫古巴；试图通过在古巴设置中近程中远程导弹来达到与美国战略力量的平衡；为了增加同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赫鲁晓夫的个性对决策的影响。美国迫使苏联导弹撤离古巴的决策过程是选优淘劣的过程，先后研究过的决策有：无所作为；谈判解决；空袭；封锁。肯尼迪政府经过反复研究，最后确定了封锁的决策方案。文章对封锁的优点作了全面的分析，认为决策的理性化、程序化和较为切合实际是它成功的关键。

1962年10月，世界经历着、尤其是美苏经历着一场来势突兀、非此即彼、只能在前进和后退之间进行选择的危机——古巴导弹危机。这场危机是一场政治、军事和核方面的危机，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核时代的最严重对抗及相互考验，也是尖锐的冷战时期终结的一个标志<sup>①</sup>，世界由此进入了一个相对缓和的时期。时隔30年，“它仍是研究危机处理艺术的重大实验室”<sup>②</sup>。分析这个危机的典型案例，对于我们在当今这个风云变幻、纷繁复杂、危机迭出的世界里正确认识和处理危机还是有益的。

## 古巴导弹危机的缘起

古巴导弹危机的发生，是国际冷战格局中形势变化的结果，是苏联进攻和美国反进攻中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 (一) 苏美两国思想认识上的新变化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在苏美方面都出现了战略上转折的契机，也确是在寻求战略转折。

在苏联方面，赫鲁晓夫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对美方针，提出了“世界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论断。他对战争问题提出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认为，如果爆发“一场热核战争”，“将没有胜利者”；一是认为，不论任何规模的战争，哪怕“一点火星”也会酿成核大战。在这种新战争观的支配下，赫鲁晓夫认为采取“三和”政策是同美国在核时代竞争的有利选择。其中“和平共处”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原则”和“总路线”。这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不进行战争”及在经济方面进行“和平竞赛”；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具体的“合作”<sup>③</sup>。为此，赫鲁晓夫先后与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举行“高峰”会谈，创造了戴维营和维也纳“精神”。他的灵活外交还在于“危险时期”所表现出的特别容忍和克制。

在美国方面，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公开提出了“和平取胜战略”。尽力以他那种迂回曲折

而又断断续续的方式来冲淡严峻的冷战气氛<sup>④</sup>。肯尼迪上台后，提出“对橄榄枝和箭给予同样的重视”<sup>⑤</sup>。这种把“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的”政策及“假如可能，便通过和平的手段，假如必要，则通过坚决的行动”的做法成了肯尼迪处理重大外交事务的指南，这一点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突出地显示出来。

## （二）古巴革命与美苏在古巴问题上冲突的由来

卡斯特罗在他领导的古巴革命于1959年获得胜利后，便开始推行他的社会革命计划。在土改中，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27.2万英亩耕地和3万英亩牧场被征收，属于美国所有的15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也被征收<sup>⑥</sup>。由于古巴的国有化政策，美国在古巴的400多家工商企业和银行被收归国有，资产总额达15亿美元。古巴实际上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一个美国企业家形象地说：“这场革命也许象一个西瓜，愈切愈红。”<sup>⑦</sup>卡斯特罗也说：“我要在古巴采用一种象俄国人所采用的那种制度，甚至采用比俄国的制度更好的制度。”<sup>⑧</sup>卡斯特罗的这一选择，使美国极为恼怒和失望。在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内出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的政权，是美国统治者难以容忍的。而在古美关系恶化的同时，古苏关系却得到了大大加强。阿·依·米高扬在1960年访古期间，宣布苏联向古巴购买500万吨糖，并给予古巴1亿美元贷款。同年苏古建立外交关系。古苏关系的这种加强和发展，引起了美国的不安，担心苏联势力的渗入会影响它在拉美的霸权。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停止了对古巴的一切经援和停止从古巴进口食糖，禁止除医药和食品外的一切货物输往古巴。而在同时，古巴同苏联、东欧的贸易在古巴对外贸易中所占比例，从1960年初的2%上升到年底的20%，到1961年5月上升到75%。古巴转而依赖苏联，是美国对古巴社会主义化的忧惧而进行制裁与苏联为着自己的扩张目的趁虚而入的结果。到1960年7月美古关系达到危机时，赫鲁晓夫宣称：“苏联要为争取独立的古巴人民说话，并对他们提供援助。”他警告美国说：“如有必要，苏联的炮兵就能用火箭炮支援古巴人民。”<sup>⑨</sup>艾森豪威尔则称：“美国将不因赫鲁晓夫先生所作出的恐吓而不敢承认自己的责任。”它也不会“允许在西半球建立一个为国际共产主义所主宰的政权。”<sup>⑩</sup>以后的历史进程证实——当时赫鲁晓夫所说的“用火箭炮支援古巴人民”并非戏言。而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对艾森豪威尔声明的实现。

在竞选和当选总统前后，肯尼迪就反复提到古巴问题。他“明确表示我们不打算让苏联把古巴变成它在加勒比地区的基地”<sup>⑪</sup>。1961年4月，肯尼迪批准了由中央情报局训练的1453名古巴流亡者组成的突击队在猪湾侵入古巴南海岸，结果被击败并投降。这使肯尼迪总统“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sup>⑫</sup>。人们开始怀疑肯尼迪的对外政策，把“新边疆”看成是一种冒牌货和诡计。“美国的威望在一天之内比在艾森豪威尔胆小而优柔寡断的8年中降得还要低”<sup>⑬</sup>。卡斯特罗再次肯定了与苏联的关系，并宣布，“我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且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也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sup>⑭</sup>。猪湾失败对肯尼迪造成了强大的外在压力，要求他在国际范围内的某个地方取得成功。“当赫鲁晓夫愚蠢和莽撞地把导弹运进古巴时，他给了肯尼迪一个摊牌的机会”<sup>⑮</sup>。猪湾事件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了以后苏联人在古巴部署各种军备的理由。“严峻的事实使卡斯特罗和赫鲁晓夫确信——古巴处于来自美国的严重威胁之中”<sup>⑯</sup>。

此外，肯尼迪政府从上届政府手中继承下来的外交问题也不是令人乐观的。在老挝、南越、柏林和古巴这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停战线上被打穿的”“四个关系重大的洞口”问题上<sup>⑰</sup>，肯尼迪政府基本上没有取得大的进展。总之，迟至1962年秋，肯尼迪在就职近2年

却继续处于一种令人困恼的境地，还远远没有在对外政策上得到一个美国公众视之为明白利落的成功<sup>⑩</sup>。这种政治处境以及民主党对即将进行的国会选举所抱的希望不容许美国遭受进一步的挫折。这就是赫鲁晓夫敢于冒险在古巴设置进攻性武器和肯尼迪敢于采取强硬立场迫使赫鲁晓夫撤出导弹的背景。

## 苏联导弹运进古巴的决策分析

1961年古巴导弹危机是围绕着苏联导弹运进古巴开始的，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分析苏联的决策动机。

### （一）为了保卫古巴，以使古巴免遭美国进一步的侵略

这一点是苏联官方所持的基本观点，也是赫鲁晓夫本人一贯的主要观点。他曾说：“我们确信美国人不会容忍古巴卡斯特罗政权的存在，他们害怕社会主义的古巴将会变成一块把其他拉美国家吸引到社会主义去的磁石，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sup>⑪</sup>。这就突出了把古巴作为在拉美的社会主义广告牌的作用。而这正是美国所担心和反对的，艾德莱·史蒂文森就说，“共产主义在美洲的存在是不容谈判的”<sup>⑫</sup>。因此赫鲁晓夫认为，“我们有义务尽一切可能来保护古巴……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决定性的步骤来保卫古巴，我们很容易失去它”<sup>⑬</sup>。那么用什么办法来对付美国干涉古巴呢？他认为他在1962年5月对保加利亚访问时“想到了在古巴装置核弹头导弹的主意”<sup>⑭</sup>。其具体想法是秘密设置，不让美国察觉，如果已装好并可发射时被美国发现，美国就不会轻举妄动，即便能毁掉一些，也不会是全部。就凭着这种一厢情愿的侥幸心理，苏联政府制定了在古巴设置中程导弹并供应可带核弹的伊尔—28型轰炸机的决策。仅仅为了保卫古巴而作出如此贸然决策是有疑问的。为了保护古巴，苏联可以采取的措施就是把华沙条约的保证扩大到适用于古巴，但是苏联从未在国外部署过核武器。在这样离美国只有90英里的地方部署核导弹武器也不合常规。因此，保卫古巴只是导弹运进古巴决策的依据之一。

### （二）苏联试图通过在古巴设置导弹来达到与美国战略力量的平衡

赫鲁晓夫承认“除了保护古巴，我们的导弹也可在达到西方所谓的‘均势’中起些作用”<sup>⑮</sup>。当时美国核力量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优势可能促使苏联出此下策。在1962年，美国拥有大约200至250枚洲际弹道导弹，苏联大约只有50—70枚。美国的北极星潜艇中还有约144枚导弹。美国有600架以上处于15分钟戒备的洲际轰炸机，苏联人只有约200架<sup>⑯</sup>。这样，为弥补洲际战略力量的不足，苏联采取了在古巴部署中近程中远程导弹的简便办法，“事实上使苏联打击美国的能力增加了一倍”<sup>⑰</sup>。尽管如此，整个核力量对比仍然对美国有利。但是设置在古巴的这些导弹因为来自美国南面，可以逃过美国的预发警报系统，使美国在遭到袭击时的报警时间从15分钟缩短到3分钟。这些导弹的优点就是可以实施突然袭击，并把美国大部分国土纳入其可靠射程之内。由于这些导弹是缺乏伪装掩蔽易受攻击的，也只适于进行第一次打击。但这样做在战略上的好处是明显的。况且战略均势在表面上的重大变化还会对国民意志和世界领导地位这些问题产生影响，“导弹的设置必然会带来同所得的战略利益不相称的政治后果”<sup>⑱</sup>。事实上，美国后来主要的忧惧并采取强硬措施进行对抗就是因为这种表面变化带来的现实的变化。

### （三）为了增加同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

赫鲁晓夫认为，“美国已经用轰炸机基地和导弹包围了苏联。我们知道美国在土耳其和意

大利的导弹是对准我们的”，因此，“我要决定一种既能对付美国威胁又能避免战争的行动方针”<sup>②</sup>。苏联《外交史》也说，“苏联曾不止一次地建议美国撤除设在他国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但这些建议都遭到拒绝”<sup>③</sup>。所以苏联就通过在古巴设置导弹，使“美国人知道自己的国土和人民遭受威胁是什么味道。”以此施加压力来迫使美国撤出在土耳其的导弹。这在赫鲁晓夫1962年10月27日的信中说得更明确：“我们同意从古巴撤出您认为是进攻性的手段，……贵国代表要发表声明：美国方面考虑到苏联的安全和焦虑，将从土耳其撤出自己的这种手段”<sup>④</sup>。这是一种筹码。而在柏林等敏感问题上给美国施加压力，迫其就范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随着导弹在古巴的设置，极大的压力就能施加于柏林(问题上)<sup>⑤</sup>。苏联在非正式讨论中坚持把柏林问题同古巴问题联系在一起。这说明苏联要用导弹作为杠杆，迫使美国人对苏联的主张作出让步并撤出柏林，以达到过去在柏林和日内瓦对美国施加压力所没有达到的目的<sup>⑥</sup>。

#### (四) 赫鲁晓夫的个性对在古巴设置导弹决策的影响

在作出把苏联导弹部署在古巴岛的决策时，赫鲁晓夫本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赫鲁晓夫为人好冒风险，图新求变，但感情易冲动，莽撞而又反复无常。这种不稳定个性早在1960年秋他在联大的“皮鞋外交”和柏林危机中有所反映，并导致了思想认识上和实际工作中的轻率、不谨慎和缺乏预见性。他错误地低估了美国总统和美国人古巴的苏联导弹可能做出的反应。“把肯尼迪当作一个说话强硬而行动怯懦的弱者”，认为“美国本身‘过分自由主义，太开明了，因此不能打仗’”<sup>⑦</sup>，甚至谈到肯尼迪时这样说：“我怎么能同一个比我儿子还年轻的人打交道呢？”<sup>⑧</sup>他还认为美国人太胆小，不敢冒核战争的危险。猪湾事件、维也纳会议和柏林墙似乎证实了他的这些想法。他相信“苏联能够安然无事地在古巴设置导弹而不会受到美国的断然反对。”<sup>⑨</sup>他看到了他想要看的东西，而且极度轻视不调合的证据。他“并未预见”到如果导弹一旦被发现并通过正式渠道将这些情况通报给肯尼迪时，肯尼迪将会作出怎样的反映。”<sup>⑩</sup>事实是赫鲁晓夫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既导致了导弹的进入古巴，又导致了导弹的撤出古巴。

### 美国采取封锁政策的决策分析

从1962年10月16日肯尼迪总统获知在古巴有苏联的进攻性导弹，到10月20日决定对古巴实行封锁以迫使苏联撤出其进攻性导弹为止，那个后来被称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各抒己见，几经争执，终于选取了偏好度最大的方案——封锁决策。

#### (一) 不能无动于衷，听之任之

国防部长麦克拉马纳认为，美国已经长期生活在苏联导弹的射程之内，“导弹就是导弹，至于你被从苏联发射的导弹或从古巴发射的导弹杀死，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差别？”<sup>⑪</sup>并认为，如果把苏联这次在古巴部署导弹看得若无其事，我们就可以防止他夸大导弹的重要性，因此不必采取行动。肯尼迪说：“最坏的事情将是无所作为”<sup>⑫</sup>，认为如果美国接受了苏联的这一步，那么下一步就会接踵而来。他关心更多的是这些导弹对全球政治均势的影响：“他们这样做，就能在政治上改变力量均势，会给人以改变均势的印象，而人们的印象却是有真实价值的。”<sup>⑬</sup>他认为美国不能示弱让步。

#### (二) 通过外交渠道解决问题行不通

前驻苏大使查尔斯·波伦和卢埃林·汤普森曾敦促肯尼迪进行私下谈判，“在采取军事行

动之前，应该试用这种办法。”<sup>③⑨</sup>当时供选择的外交行动是呼吁联合国或美洲国家组织建立观察小组；举行直接同赫鲁晓夫谈判的最高级会议；以撤除美国在土耳其的导弹基地作为换取苏联撤除在古巴导弹基地的办法。肯尼迪认为让联合国辩论这个问题会是一个拖延时间的过程，赫鲁晓夫可以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而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在此期间却将变得确实可用。同赫鲁晓夫的最高级会谈则是不现实的。另外，尽管在土耳其部署的朱庇特导弹已经陈旧过时，但不能在危机期间撤除，否则就会被盟友和敌人说成是“在压力下的让步”。肯尼迪认为以撤除一个盟国的武器作为条件换取美国的安全会动摇乃至搞垮西方联盟，甚至还会引起一种慕尼黑心理<sup>④⑩</sup>。总之，“在此刻进行谈判的想法，会被看成我们承认自己心虚理亏和在军事态势上的软弱。”<sup>④⑪</sup>谈判之路就此堵死。不进行公开的谈判也是为了掌握主动权，以做到出其不意，从而削弱苏联的反应能力。

### （三）排除空中打击方案

空袭方案就是应用一种“外科手术式”的袭击，由美国飞机用常规导弹在几分钟内突然而迅速地把导弹发射场消灭掉。该方案由于可能干净利落和有效地搞掉导弹而具有对大多数人的吸引力，肯尼迪本人在初期也倾向于这种解决办法。但随着讨论、争辩、分析，空袭方案的缺陷日益明显。首先，采取空袭方案会排除掉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特别是那些非军事性质的倡议，这样就会使决策单一化，违背了执委会召开的初衷；其次，采取空袭的措施同美国的传统和历史是相抵触的。罗伯特·肯尼迪听了空袭建议后便想起了日本东条计划袭击珍珠港时的情景，他说：“美国的传统和历史绝不允许采取这种行动方针。”<sup>④⑫</sup>肯尼迪总统对此也深有同感。空袭还会炸死约25000古巴人及数目难以估计的苏联技术人员，这一方面道义上说不过去，而且如果炸死了苏联人，就有可能激起苏联在军事上的反应。他们“决不会听任咱们把他们的导弹搞掉，杀掉一大批俄国人，就那么算了。”<sup>④⑬</sup>还有人认为由于空袭杀死了成千上万的古巴人，会永远损害美国在这个半球的地位，盟国及大多数国家也会认为突然袭击是一种过分的反应；再次，“外科手术式”的空中打击在军事上也是不现实的。空袭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导弹都会被摧毁掉，既有升级的可能，又可能会导致入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转而去寻求其他的可供选择办法。

### （四）决策优化选择结果——封锁

决策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分析。在执委会成员逐一分析排除具有较多不利因素的方案后，一种较有可能既防止苏联进一步运进导弹，又能逐步施加压力以迫使苏联撤出导弹，而且还能控制局势的方案——封锁逐步为执委会大多数人所接受。封锁与空袭等方案比较是一种更为有限、更为低调和更为有效的军事行动，其可行性更强。这是因为：第一，封锁可以避免直接诉诸战争手段，具有灵活性，挑衅性也少。它给赫鲁晓夫一种选择，只要使他的船只避开，就可以避免一切直接的军事冲突。它可以在不打一枪不杀伤一名苏联和古巴公民的情况下实行起来，不大可能突然出现直接的军事报复。封锁也给肯尼迪总统选择权，更多的自由行动权，可以用最精确、最迅速的方式来组织和执行封锁。“在核武器时代，有个选择的机会……是非常重要的”<sup>④⑭</sup>。第二，封锁使美国方面可以控制局势，“随着形势的需要逐步升级或迅速升级”<sup>④⑮</sup>，在必要时扩大到对非军物质的封锁，使它又成为一种逐渐加强压力的办法。第三，封锁是慎重克制的，可以避免重大伤亡和进攻古巴领土，“易被美洲国家组织，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至国内和世界舆论所接受”<sup>④⑯</sup>。这样，封锁还可以根据美洲国家组织和里约热内卢公约的有关条款作为法律根据来实施。第四，封锁在地理位置上对美国有利。古巴和苏联之间的海上交通线漫长而脆弱。如美苏在加勒比海上进行军事对抗，“不论战

略部队和地面部队可能存在的均势如何，美国海军所占的优势是毫无疑问的”<sup>④7</sup>，陆空的优势也是绝对和明显的。第五，如果封锁发生作用，苏联人可以体面地撤退。如果封锁不发生作用，美国人保有选择军事行动的自由。“如果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俄国人仍然继续搞他们的导弹基地的话——那我们就将进行空中袭击”<sup>④8</sup>。这一点也易为主张空袭的人所接受。总之，封锁“是在有限行动和无限行动之间进行选择”。执委会大多数人认为从有限行动开始比较好。肯尼迪总统同意从有限行动开始，并认为“这个方案看来是缺点最少的”<sup>④9</sup>。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肯尼迪再次召见战术空军司令小沃尔特·斯威尼上将，就空袭可能造成的后果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斯威尼坦率承认任何这种攻击都无法保证摧毁所有这些导弹或使它们全部失去作用。这给总统留下的印象更为深刻，因为这是主管司令官的看法<sup>⑤0</sup>。肯尼迪总统对封锁的决定不再有丝毫犹豫。鉴于封锁在国际法上被认为是一种战争行动，一位国务院法律顾问回顾到富兰克林·罗斯福“隔离侵略者的讲话”，建议把封锁叫作“隔离”，“它看来更少好战性而且含有一种良好的医疗意味。”<sup>⑤1</sup>大家认可了这一名称。

#### （五）肯尼迪总统的个性在最终决定实行封锁政策中的反映

肯尼迪竞选总统时一句著名的话是：“现在是使这个国家再度行动起来的时候了。”<sup>⑤2</sup>他在这里开始了挑战和接受挑战。

在获知古巴出现苏联导弹的情报后，肯尼迪冷静地要求拍摄更多的照片以增加关键性证据的数量，责成执委会成员在事实真象和美国的反应宣布以前，严守秘密，保持主动，“在赫鲁晓夫面前摆上他自己的既成事实”<sup>⑤3</sup>。

在执委会进行采取何种措施的决策讨论中，肯尼迪虽然开始倾向于空袭，但他总是不断究诘，“步步紧逼”，使大家原有的看法和意见逐渐改变，以寻找最佳的可供选择方案。他总是努力让执委会的成员们对各种问题和供选择的方案进行自由而坦率的讨论。为此，他决定不参加执委会的所有会议，因为“总统如果在场，人们的个性不免要有所改变，甚至那些个性很强的人也往往会提出一些自以为总统愿意听取的建议。”讨论中不分职别，地位高低，“大家都有平等的发言权。”<sup>⑤4</sup>可以说，执委会成员的意见没有一个是从头到尾始终如一的。他们考虑了整个问题，从多角度进行考察，对各种不同的前景进行评估。同时人与人的冲突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把讨论集中到手头的问题上。肯尼迪还经常和级别较低的顾问保持个人接触。这样，“尽管时间很紧促，尽管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解决问题的诱惑力很大，总统关于导弹危机的最后决定还是遵循了一种比较公开进行辩论的程序。”<sup>⑤5</sup>肯尼迪“没有在极不一致的意见之间进行选择。他只是认可他的顾问对每一种可能性进行充分的探讨以后达成的意见。”<sup>⑤6</sup>正如肯尼迪本人所言，“如果我们在星期三，即最初的24小时内，就不得已而采取行动，我们或许不会作出如象我们最后所作出的那样慎重的选择。”<sup>⑤7</sup>换句话说，就不会有既排除了导弹又避免了战争的结果。

在一经确认封锁较之其他方案有更多的优点，而且“看来是缺点最少的”时，肯尼迪就断然作出了封锁决策。既使如此，他还是考虑在行动的同时，也不让他的对手失去退却的机会<sup>⑤8</sup>。在以后的公开对抗中，他总是冷静而准确地估量，敏感地校正对危机的控制和对力量的灵活使用。他要求在行动中千万不能出差错，为此亲自掌握封锁的每一个细节，具体可以登上哪艘船进行检查和在什么情况下登船都得由总统来决定。他指出，“在所有这一切中，巨大的危险和风险就是估计错误——判断错误”<sup>⑤9</sup>。“我们应该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走上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sup>⑥0</sup>。因此，他在每个阶段都让对手有时间去进行深思熟虑和重新考虑问题。他谨慎小心地不迫使对方作出“痉挛性”反应，或是断其退路。

根据以上对苏美两国关于古巴导弹决策过程的分析,不难看出,苏联的决策从一开始就带有某种盲目性、冒失和危险,缺乏必要的预防和后续准备。因此,当它一碰上美国有充足的军事准备作后盾,具有可战可和灵活性、主动性,并实施全面周密的封锁决策时,就显得力不从心,措手不及,面临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避免核战争,走上退却之路。因此,决策的理性化、程序化及切合实际是决策成败的关键。

#### 注 释:

- ① [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 ② *Foreign Affairs*, Fall 1987. P170.
- ③ 《赫鲁晓夫言论》第1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年版,第20、21页。
- ④ [美]J·布卢姆等:《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63页。
- ⑤③⑦ 《总统公文汇编:约翰·F·肯尼迪》,华盛顿1961年版,第23、898、889页。
- ⑥ 《纽约时报》1959年5月29日
- ⑦ [美]托马斯·帕特森:《美国外交政策》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30页。
- ⑧⑩ [英]G·巴勒克拉夫:《国际事务概览,1959—1960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13、633页。
- ⑥⑭⑮⑰⑱⑲ Richard J·Walton, *Cold War and Counterrevoluti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John·F·Kennedy*,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1972, P104, 105, 116, 104, 115, 123.
- ⑩⑰ [英]D·C·瓦特:《国际事务概览,1961年》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1页。
- ⑫⑳ [美]马克斯韦尔·泰勒:《剑与犁》,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22、350页。
- ⑬④ [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17、550页。
- ⑮⑳ [美]拉塞尔·F·韦格利:《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538、538页。
- ⑰⑱⑲⑳㉑ [苏]《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96—697、697、698、697—698页。
- ㉒⑳ [英]休·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99、699页。
- ㉓ [苏]A·C·阿尼金等:《外交史》第5卷,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61页。
- ㉔ 何春超等:《国际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80》,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页。
- ㉕⑳⑳ John·G·Stoessinger, *Crusaders and Pragmatists*, W·W·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85, P151, 154, 147, 155.
- ㉖ [英]D·C·瓦特:《国际事务概览,1962》,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
- ㉗⑳ 《古巴导弹危机内幕》,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2、10、41—42页。
- ㉘ Elie Abel, *The missile Crisis*, Bantam Books, New York 1966, P133.
- ㉙⑳ [美]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97、613页。
- ㉚ [苏]尤·阿克秀金:《赫鲁晓夫——同时代人的回忆》,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第81页。
- ㉛⑳⑳ [美]M·贝科威茨等:《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背景》,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58、163、157页。
- ㉜⑳⑳⑳⑳ [美]罗伯特·肯尼迪:《十三天》,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9、7和14—15、4、25页。
- ㉝⑳⑳⑳⑳ [美]西奥多·索伦森:《肯尼迪》,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540、533、533、540和541、81页。
- ㉞ John Barlow Martin, *U.S. Policy in the Caribbean*, Westview Press, Inc, Colorado, 1978, P87.
- ㉟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第四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61页。

(本文责任编辑 吴友法)